

[中央高层关注◎著名专家研讨]

中南海 讲座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与中国发展道路

(内部资料 供高中级干部参阅)

国发研联资料组编

下
册

中央高层关注 著名学者研讨

中南海讲座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道路

(内部资料 供高中级干部参阅)

下 册

国发研联资料组编

三、中国式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新型工业化研究

吴敬琏

一、经济学对不同增长模式的分析

现代经济学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这四个发展阶段是：（1）“起飞”以前的阶段，即产业革命以前，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靠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2）19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支撑的。按这种模式进行的工业化叫做“旧型工业化”。（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靠效率提高实现。这种增长模式体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4）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IT），所以，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信息时代或者叫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信息化带动。

1、经济学对“旧型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进行，经济增长逐步摆脱了“起飞前”的状态，摆脱了土地约束，依靠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是靠狭义的工业化，即用大机器工业作业去替代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还要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这就要有钢铁等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作为基础。所以，旧型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增长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现代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深化）。

马克思最早指出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的现象：一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随着用于购买机器的不变资本（物质资本）比重的不断增加，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不断降低，利润率必然会下降。利润率的不断降低导致竞争加剧，必然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另外一条规律叫“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工资总额的相对减少，所以就业岗位就会减少，或者使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从而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根据上述严密推论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列宁和斯大林与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列宁在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另一个规律，即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用

列宁的话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费资料增长最慢。到了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在吸收“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和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第Ⅰ部类投资决定增长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路线”，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是自发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可以自觉地来做，不需要从轻工业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借助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可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在1920年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和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对西方经济学家具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并指出，越是到了高级阶段，资本品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比例愈高。他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作出预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后，资本品的生产将超过消费品的生产。由于当时还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在经济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总体框架下，重工业在工业中占优势也就意味着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所以，霍夫曼的这个预言被人们推演为工业化后期将是重工业化阶段，此时重化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并被称为“霍夫曼定理”。因为这个“定理”是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推演而来的，它也被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

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受到早期增长模式类似的影响。例如，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概括。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资本产出率是不变的，所以增长就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越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的基本工作仍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相信，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的秘诀是增加积累，增加投资。

2、经济学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

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表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失业率提高，以及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平均利润率没有因为资本深化而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大体保持不变，而工人的工资水平随着人均产量的增加反而呈上升态势。同时，与霍夫曼所提出的理论相反，在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和占主要地位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工业中的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为什么马克思和霍夫曼的预言没能实现呢？原因并不在于马克思和霍夫曼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即增长主要不是靠物质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推动。

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的研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致有以下三个：

第一，“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技术进步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即“熟能生巧”。这种进步是改良性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有革命性的改进。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某些技术虽然也是在与科学家交流中产生和应用热力学原理的结果，但大多数技术改进仍然是基于经验和由工匠进行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19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对科学发明和科技创新激励的制度化，从而大大地激发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的创新热情，使得基于科学的技术大量涌现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层出不穷使生产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发展最快并对经济发展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并不是消费性服务业，而是为制造业、农业等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前端的教育、研发（R&D）、设计、采购，后端的营销、维修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等。

不管是就业人数还是产值，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也就是在进入所谓“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服务业在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都已成长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20世纪制造业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我们现在所讲的工业或制造业，其实是已经和服务业相融合的工业和制造业。比如索尼照相机，它主要的成本体现在研发、设

计和分销、维修服务等方面。索尼作为制造业企业，它最赚钱的领域是什么？是影视业，而影视业的内容又是服务业提供的。所以，有人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的工业化称为“服务业一工业化”。

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理能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意义。亚当·斯密早就指出，技术进步是以分工深化为依托的，但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各分支之间的交易会愈来愈频繁，因此用于交易的资源也会增加。而服务业正是处理交易活动的，所以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乃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服务业一方面能够减少生产环节的成本，但是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越来越高，服务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越是发达的分工，越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完成交易，而发展服务业就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基本手段。

提高效率的第三个源泉是信息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现代信息技术（IT），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渗透到各行各业的信息成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新的有力武器。信息化在发达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情，但是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适宜的场合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来处理信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叫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的“新”，是相对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增长模式而言的。第二层含义的“新”，就是为工业化增加了新的加速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沿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重工业。这条工业化路线造成了农业衰退、农村偏枯等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但由于对这条工业化道路和缺乏效率的增长模式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因而在“大跃进”运动中反而把钢、煤等重工业的发展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把一切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虽然“大跃进”的荒谬做法遭到人们的唾弃，但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以及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并没有被否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在1979年和1981年两次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也的确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结果，强调要依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而没有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原因，即改变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那种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特别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些旧体制的遗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还保留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过大配置权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以市场为配置主体的，市场会把资源导向效益高的地方。但在目前，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各级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仍然掌握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二是GDP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主要的政绩考核标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服务，而并非是经济的主人。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政府是国民经济的主持者，各级政府官员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首要责任人。三是中国现行的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制度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希望发展价高税大的产业。四是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优先发展资源和资本密集、盈利性却很重的重化工业，采取了对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调拨或把价格尽量压低的政策。这种政

策至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使经济核算发生扭曲,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尽力发展那些社会效益很差但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表现为高盈利的重化工业。

如果说“九五”计划和前面的调整都是向着否定旧型的工业化道路迈出了步子,到了“十五”计划时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五”计划提出,要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主线。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提法。因为所谓经济结构是指资源配置结构,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正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内容。问题在于,由谁来进行调整和怎样进行调整。在前面讲的体制条件下和政策环境中,许多人都把调整结构看成一种政府行为,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调整经济结构。按照中共十四大的决定,市场应当在调整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十五”计划期间,我们看到,许多地方要发展哪些产业,以哪些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以至重点扶持哪些企业等等,都是由当地主要领导来决定。在前面提到的现行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条件下,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实现经济重型化的方针,运用自己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或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种不顾资源禀赋的状况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浪潮,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扬长避短地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中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和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然而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变成了扬短避长,必然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二,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存在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 20 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前述向重化工业倾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相反,不少企业安于做简单加工,靠价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和人民币投入赚钱,甚至做一些表面赚钱的赔本买卖。这也是中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不足,大大低于同等规模的外国企业的重要原因。

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1985 年,世界银行的中国调查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根据中国经济结构与钱纳里著名的“大国模型”的比较,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一项重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比重不但大大低于“大国模型”中大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好转,但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01 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但低于世界各国 60% 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 45% 的平均水平。在近两年的重化工业浪潮中,服务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

第四,造成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实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把原本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收紧,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中国企业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使这些产品紧俏腾贵,甚至海运价格也出现猛涨。

第五,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重化工业一般具有高污染的特征,它的过度发展造成中国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加速破坏。

第六,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中国除每年城市有 1000 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还有 1 亿—2 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以解决

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沉重。然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很低的；增加就业主要要靠发展小型工商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创造新就业岗位所需的资金投入少，而且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不高。所以，资源配置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会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第七，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决不能采取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投资热潮中，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极易造成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如果投资决策普遍失误或者泡沫破灭，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风险。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林毅夫

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在社会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就业、社会救济、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1978—2004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4%，2004年GDP的规模为1978年的10.3倍，而世界同期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8%；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长16.7%，贸易规模增长了56倍，进出口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47亿美元，同期贸易依存度由9.5%增长到69.3%；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存量的小国，但是，已经成为增量的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主要来源，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前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性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赶超战略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一套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目的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安排，并实行

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直至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这种赶超战略的结果。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而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但事实证明，遵循“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却取得了前面所说的巨大成就。原因在于，执行赶超战略的转型经济的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

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一个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取决于该经济中的企业在行业和技术上的选择是否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比较优势可以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在亚当·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这个概念已经在很多地方利用。但对之加以提炼并明确提出的则是李嘉图，在他那里，比较优势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这个理论提出来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各地拥有的资本量，二是各地拥有的劳动力，三是各地的自然资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最近几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这个概念国内国外都非常盛行，于是，有不少人就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 200 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则是应该用竞争优势理论替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了。我想进一步分析并说明，各地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

波特教授所讲的竞争优势理论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一个地方要形成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该地有什么廉价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就要多利用这些廉价要素。其实这也就是比较优势的概念，比如说为什么在劳动力多资本少的地方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那个地方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少，资本必然要相对昂贵，所以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其实是比较优势。

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还有另外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规模。一个地区生产什么产品、发展什么产业，只要这个产品和产业在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市场规模，就可以发展。二是发展的产业最好是在当地形成产业群，很多企业生产产业链中各种不同的部件。三是这一产业是竞争性的产业。

与比较优势相比，市场规模显然不那么重要。从历史实证来看，美国是一个大国，当然有其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也有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小的国家，比如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等，都是很小的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也发展得非常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现代经济中，交通运输条件弥补了一国国内市场规模小的不足，国际规模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这样看来，大国在发展某些产业上固然有其优势，但这些优势也完全没有办法补偿比较优势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从产业群和市场竞争性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恰恰是这一产业一定要符合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没有比较优势，基本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以美国为例。今天

美国人均收入达3.8万美元,其人均资本拥有量非常多,造成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在这样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非常稀缺非常昂贵的国家,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本上没有可能,所以,不会有太多企业投资这个产业,生产相关的部件,所以形成不了产业集群,除非政府予以补贴保护。在开放的市场中,国家保护补贴的企业数量一定很少,这样会形成市场垄断而不会有竞争。这样看来,竞争优势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任何产品要占有市场、获取利润,就一定要有竞争力。但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首先就是比较优势。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不可能有产业集群、市场竞争形成竞争优势。

四、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编制“十一五”规划,以指导各地的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突出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应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可能成千上万,每个地方的资源不可能把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所有产品都生产出来,这就必须作出选择。

如何选择?我有四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选择当地有传统的产业。举几个例子:扬州有一个“杭集镇”是全国的牙刷之都,如果杭集镇牙刷厂不开工,全世界的牙刷都要配给。这个镇从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有历史传统。南昌有一个“文港镇”,是全国的铁笔之都,国内生产的70%的铁笔都出自那个地方,“文港”这个地方也是从宋朝就开始生产笔了,所以也有历史传统。

二是当地有国有企业。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在很多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当时我国一穷二白。改革开放26年,我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9.4%,经济规模提高了10.3倍,现在,资本拥有量、技术拥有量和上世纪50年代比已经改善非常多,许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来的企业,现在其实可以焕发活力了。以重庆为例,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摩托车生产之都,全国摩托车每年生产一千多万辆,重庆要生产400多万辆。这是因为,过去的重工业基础,为此打下了许多装备业的基础,当地有国有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现在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

三是当地要有独特资源。宁夏的“枸杞子”、新疆哈密葡萄干,都是当地的独特资源。

四是当地已有产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义乌,原是农区,基本上没有工业,但现在义乌有很多工业,如织袜业、文具业等,因为义乌有市场,从销售可以延伸到生产,生产的产品属于劳动力密集、技术相对比较传统型的产品,符合比较优势,又同市场经验相结合。

许多转型经济的企业是赶超战略的产物,其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其生存只能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所以说,转型经济中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因为其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没有解决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内在问题的情况下,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这也是“休克疗法”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

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在社会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就业、社会救济、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强调技术创新、人才、资金以及政府的重要性。

1、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技术创新。具备同一比较优势、又有历史传统的地方非常多，各地在竞争中如何脱颖而出？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科学家讲技术创新一般是讲新发明，但是对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而言，只要新采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了。这一点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许多在发达国家也许早已过时的技术，拿到国内来都比现有的技术要好很多。只要拿过来，就是经济学或者企业家所讲的技术创新。众所周知，最前沿技术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失败概率也非常高，当然，研发以后的专利费等收益也非常高。在一般人看来，研发成功、有市场的技术有很大的回报率，可是，按照统计学研究，95%的研发不会产生任何可用的技术，5%可以有技术被研发出来、申请到专利，最终，十项研发中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大概只有一项。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引进不需要成本；即使用成本付专利费，也只需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一就够了。为什么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几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用了40多年时间，到1988年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我国改革开放后，连续26年实现了平均9.4%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奇迹的发生，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比较好地引进了技术。

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研发了。当在某一产业上我们自身具备了比较优势，而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没有在同一产业上具备比较优势，这种状况下，通常我们必须自主研发。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技术，并不意味着技术越高越好。研发新技术的动因，在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在质量相同的状况下，成本总是越低越好。一些地方邀请我们去参观，当地人总是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那里的生产线是德国引进的，或者是意大利引进的，只需一个工人就可以了。我经常会产生疑问：引进这样的生产线，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其实，国内的劳动力便宜，引进技术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如何增加更多劳动力的使用。

2、人才的重要性。把资源与技术市场结合起来，靠的是人才。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地区，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企业，背后总有一群人才。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许多有名的村庄、企业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有能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市场资源的人才。进入21世纪，原来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人，会继续有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涌现出来，然而更多的会是从正规的学校教育里培训出来。学校教育也是一个进程，在市场中面对的是竞争，在学校里通过考试也是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大浪淘沙。各地要在选用人才上多花力气，尤其进入21世纪，人才一方面可以当地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面引进。有时候引进一个人才就会形成一个产业。在美国与日本的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开放经济是从全球引进人才的，而日本则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基本只用当地人才。

3、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发挥比较优势，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有什么特点？很明显，它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还很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一方面，金融机构先天性地爱富嫌贫，国内银行目前还是以四大银行体系为主，大银行对小额贷款通常没有兴趣。这就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必须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当然，国内资金固然重要，而外资也很重要，我们引进外资，实际上不仅引进来资金，同时也会引进人才、技术和市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国内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很大程度上就同境外的资金密切相关；珠三角的发展主要靠香港和台湾的资金，长三角的发展除了当地的产业基础以及台湾的资本外，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息息相关。

4、政府的作用。研究经济学的人受主流经济理论影响，一般总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政府只需要提供基础设施、安全、法律等服务。这样的观点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则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发达国家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是未知的，政府没有办法干预。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产业发展轨迹则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市场体制还不完善，需要政府积极参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所说的：

每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如何成为明智的政府？我提供三点意见，一要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顺着方向推动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二要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政府尤其要做好服务，把当地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第三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的角色是搭台，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唱戏的主角必须是企业。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王梦奎

我国 21 世纪初进入新的阶段,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实现了第三步与第二步的有机衔接,为第三步战略部署规划了一个务实而又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开端。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确实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问题需要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观察和处置。

进入新阶段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和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我就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讲些看法,提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以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国际舆论关注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焦点大多也是资源和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单位 GDP 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因为:

第一,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供给缺口越来越大。进口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但当今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作为新进入者受到排挤和遏制。至于水资源短缺,是不能通过直接贸易解决的。

第二,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增长,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新阶段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尖锐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所谓绿色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贸易壁垒日益增加,国际压力加大。环境不再是软约束,靠拼环境求增长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竞争优势的变化。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 GDP 增长速

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城市熟练工人普遍供不应求,局部地区普通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也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一些地方的“民工荒”,是由于农村收益相对提高,还是结构性问题,或者是表明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值得研究。我国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优势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尤其突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还不够发展的表现,也有些与发展不当有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而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资源和环境并不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些国家资源禀赋远不如我国,并没有妨碍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一些资源富集国家却至今贫困。未来几十年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有供应潜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如果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压力很难避免,那么:第一,我们更应该把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术进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的变化大体呈倒“U”型,工业化中期达到顶峰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持续时间越短。我们完全可能通过采用新技术而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持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投入完成工业化进程。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

第二,我们更应该把优化产业结构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可以抑制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比较发达的省、市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的经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抑制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

第三,我们更应该合理规划工业发展,注重分析国内外市场长期供求趋势,避免重化工业盲目扩张。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避免过分超前和铺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认真选择,防止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四,我们更应该注意协调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改变增长速度绷得太紧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加快增长速度,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我们更应该注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规划、建设、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杜绝浪费,厉行节约。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健全价格形成机制,要着重解决价格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内部化。政绩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综合评价考核制度。

二、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2004年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等因素,全国经济几何重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标志着我国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

察。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经济发达地区这类产业可能发展更快,这是拉大地区差距的因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未来几年逐步释放,可能进入平稳增长,有的目前已经供求平衡甚至产能过剩,以采掘业实现高增长的地区如果不实现结构升级,就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往带动东部地区增长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但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东部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中西部发展环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国家区域政策可以发挥或者减缓某种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改变现阶段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考虑到起相反作用的诸多因素,看来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需要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抑制差距继续扩大。这应该作为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需要特别给予扶持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发展严重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地区。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发挥各地优势,又有利于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包括财税制度、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制度),才能使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致成为恶性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什么样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而不致形成优惠政策的轮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地区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反映。显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农村,而东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往往大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可以佐证。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何时会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有不同估计。2020 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研究发现,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 GDP 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地区人均 GDP 高的地区一般城乡差距较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下,农村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

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会快于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农村现代化是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年对东、中、西部地区共 2749 个行政村的调查,有近 50% 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劳动力中,有近 40% 常年从事非农业。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这项调查中,有 74.3% 的村干部认为,本村能够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已经出去。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反映全国的普遍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调查佐证,但这项调查大体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 and 对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和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范围和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大有作为,但不能期望过高。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创造发展环境,但不可能给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提供”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

三、以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